

# 试论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

任道斌

唐宋时具有“武备”、“戍守”意思的“镇”，到了明代，其含意也由“分防厅汛”转而成为“人烟聚落”之所<sup>〔1〕</sup>。这些小于县而大于村的“镇”，又往往与意味着贸易的“市”连在一起，在方志中列为《市镇》一栏，成为通商贾、聚民居的象征，有时亦被称作“镇市”，或大聚落为“镇”，小聚落为“市”。所以明代的市镇，其经济功能较为显著，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它犹如社会经济肌体的脉搏，“善观国者”，可从市镇的盈缩消长“察盛衰”<sup>〔2〕</sup>。

杭嘉湖平原是明代经济发达区之一，该地东临大海，西枕苕溪，北濒太湖，南依钱江，沃野如砥，运河如带。既富湖海之利，又足桑麻之饶，成为明王朝的重要绸米、财税来源之地。因此，对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作些考察，显然对我们深入研究明代江南社会经济，认识封建经济的若干发展规律，是有典型意义的。

本文拟就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作些初步探讨。为了明瞭农业的商品化生产与工商业市镇之间的关联，文中所述并不包含府县行政权力机构所在地的城关市镇，仅以明清方志所列市镇为讨论对象。

## 一、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情况

明代杭嘉湖平原的市镇，在宋元以来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旧有市镇的恢复、兴旺；二是新兴市镇的产生、繁荣。

旧有市镇的恢复、兴旺,其较为显著者,就有如下数例:

(一)北新关市,又名青莎镇、湖墅、湖市,俗讹为湖州市,在仁和县治北十里。此地虽在南宋绍兴年间就已商贾骈集,货物辐萃,但民居不多,街廛规模仅为“一萧条”“小市”而已<sup>[3]</sup>。元末新开运河自此通苏州、湖州、嘉兴、镇江等处,纲运及赈米客舟皆由此进出,但镇上仍只是以夜市出名,人烟聚落,并不见繁盛。据《续建北新关题名记》,直到弘治时街衢才渐具规模。嘉靖时“市廛殷阜,肩摩踵接”<sup>[4]</sup>。万历初拓荆街数里,水输陆产于此集散。更有人在此筑子城包罗市河,“民居稠密,市舶楫聚”,俨然有如“都会”<sup>[5]</sup>。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大火,烧毁民居达四千余家<sup>[6]</sup>,即可见其繁盛之一斑。

(二)临平,在仁和县治东北四十里。北宋端拱元年(九八八)置镇。宋南渡以来,户口蕃息,往来辐辏,商贾十倍于昔,为首都临安北陆要津。但宋末战乱,“市井萧条”<sup>[7]</sup>,入元后民居渐盛。到明成化时,“海宁、仁和、上塘蚕丝”于此“贸易居多”<sup>[8]</sup>。演至明末,遂有地近“十里”,户近“万人”的规模<sup>[9]</sup>。

(三)长安,在海宁县治西北二十五里,南宋时称“长河堰”,系“鱼虾甚富”的“小市”<sup>[10]</sup>。元末置新堰,但占地亦不过三、四亩。尔后往来商船渐多,地益增广,明初乃于此置税课局。至嘉靖时,人烟稠密,伽蓝丛立,改称长安镇。诗人过此,有“万户千门”之喻<sup>[11]</sup>。

(四)濮院,又名梅泾、幽湖、濮川,在秀水县治南三十六里。北宋时此地只有一草市,周围平衍千顷,并未开植,称南北草荡。至南宋,曲阜濮云翔移居于此,草市渐兴,被理宗诏称“濮院”。元初濮鉴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称“永乐市”,四面皆市廛,“昔日聚落,遂以成镇”<sup>[12]</sup>。但元末遭苗兵之乱,加上洪武时濮姓奉旨他迁,宗支散逸,阡陌机杼,亦杳然散去。方孝孺过此,不禁有“十载飘零一梦中”,“濮家旧院今何在”之叹<sup>[13]</sup>。弘治、正德间,濮氏子

孙复聚，他姓亦卜居于此，“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巨商，负贲争委”〔14〕，濮院镇渐以恢复，得与他镇相并。万历时生齿日盛，拓街衢，广庐舍，“绵亘逾倍”，“肆廛栉比”，“人可万余家”〔15〕，成为嘉禾一巨镇。

（五）乌青镇，在桐乡县治北二十五里，归安县治东南九十里，为桐乡县青镇及与其夹溪相对的乌程县乌镇（又名乌墩、乌戍）之合称。北宋景德时开镇，衰于南宋德祐，再罹于元末兵火，“而民庐、寺观、书馆，举为煨烬”；间巷索然，惟有荒榛破瓦。洪武初重建，迄成化、弘治间，“居民殷富，锐于兴作，卑者高之，隘者广之，荆荒芜素无人居者，亦删刈而结构之”。民居不仅尽复，“且又过之”。嘉靖时居民“不下四五千家”。万历时“环居镇市，皆非一县之民”，幅员四达，百货骈集，“居民殆万家”〔16〕。

（六）双林，为东林、西林的合称，又名双溪，在归安县治东南五十四里。南宋初商人多聚于此，亦名商林。景德时开镇，至熙丰年间遂废，只是一村落，“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里中家有《户帖》者寥寥”，其时“户犹未广”。永乐三年（一四〇五），改名双林镇，民居渐丰。成化时人口“倍于前”，“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嘉靖中，归安大姓茅坤筑别业于此，“市廛旗亭百队，环货喧阗”，日见“地隘民稠”。万历时，“氓隶杂处”，“委巷相连”。坊巷津梁周贯，遂为归安大镇。“至崇祯朝，岁征烟户册，实得户三千有奇，口万六有奇”〔17〕。

（七）新市，又名仙潭，在德清县治东北四十五里。北宋太平兴国时始见其名。南宋时有镇将屯守。元季市肆遭兵火，至明初渐有恢复。永乐时成为聚商旅、通舟楫的市镇。尔后“民居繁，市肆斗”。正德时“昔之清冷静渊”之处，被“市民所侵多矣”，居货盈肆，“米行”而外，又有“叶行”、“丝行”〔18〕。万历以来，“街衢市巷之整，人物屋居之繁，琳宫梵宇之壮，蚕丝粟米货物之盛”，可与名镇唐栖相埒〔19〕。

(八)南潏,又名南林、浔溪,在乌程县治东六十一里。宋高宗南渡过此,其地“人烟尚稀”,仅有一“荒落”“草庵”<sup>〔20〕</sup>。入元后虽然有所发展,但庐舍稀疏,居民“寥寥数家”。明初拆除张士诚所筑旧城,是时“居民不多”。直至正德,“居民尚鲜”。到了嘉、万年间,乃具规模,成为“地小人众,居民稠密,而栉比无间旷之隙”的聚落。<sup>〔21〕</sup>明末,各货类聚,客商云集,“人物日盛”,“聚且数万家”<sup>〔22〕</sup>,成为一大镇会。

至于新兴市镇的产生、繁荣,则可从下述一些例子见其大略:

(一)塘栖,又名西里、栖里。在仁和县治北五十里,水南属仁和,水北属德清。该地宋朝时犹不为人所知,仅为“一乡村耳,居人不多也”,且“水陆交阻,盗贼出没”,“僻处腹里,鲜问津者”。元末明初始成市,尔后“民居益稠密”,弘治时成为“仁和巨镇”。正统以降,为南北往来孔道,人烟以聚,风气遂开。嘉靖时“市区氓桮,鳞次栉比,比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骛,肩摩迹累”,号为“哄市”<sup>〔23〕</sup>。万历时又有“十里歌钟塵列肆”之盛<sup>〔24〕</sup>。天启间则“烟火万家,甲第连云,实大都会所不及”<sup>〔25〕</sup>。

(二)范村,在钱塘县治南三十里,滨江。万历时“客商货物多于此停居,渐成巨镇”<sup>〔26〕</sup>。

(三)袁花,又名花溪、袁化。在海宁县治东六十里。南宋时为一小盐场。元代因海运的发展,一度兴旺。明初大姓被迁配他乡,其地人烟寥落。直到嘉靖年间,才慢慢形成袁化市,不过市中小店,“止有桃、枣、空壳黄烧饼而已”,当铺亦“止有王店人郑子东一铺”。万历时“镇上一一俱全,与杭郡无异,特少烧鹅耳”,“当铺有十四五处”<sup>〔27〕</sup>。及至崇祯,镇上繁华程度仅次于硖石,成为海宁县第二大镇。

(四)新行,又名行里、新篁里,在嘉兴县治东南五十四里。元以前不著,明初以来民物滋丰,贸易辐辏。弘治时柳琰《嘉兴府志》开始纪有新行市。万历时称水陆孔道,遂“市而为镇”<sup>〔28〕</sup>,与

王店、新丰、钟带并称。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增立社学”〔29〕。明季更成为淮扬盐商建造别业的地方,具园墅亭阁之胜。

(五)新丰,又名新坊、平林、汉塘,在嘉兴县治东三十六里。宋南渡时,汴之新丰人迁此,始见地名。元时仅立巡检司,尚不称镇。成化年间,人烟繁盛。弘治时称镇,著录于《县志》。至万历,其地居民“无虑数千家”〔30〕。

(六)王店,又名梅里、梅会里,在嘉兴县治南三十六里。元代尚未称镇,“至明中叶而渐盛”。成化时居民稠密,远近商贾往来于塘桥者,“日数千人”。弘治时遂称王店镇。隆、万间市中丫髻桥两岸,楼屋栉比,极一时之盛。镇西一带,万历以前居民稀少,而万历以来人烟滋繁,“始起造市屋,或六十间,或四十二,三十二,里西渐成市镇,其名遂相沿不改”〔31〕。明季镇中“古南禅院”成为文人社会场所。“镇民之居,夹河成聚,为里者三,为梁者十”〔32〕。

(七)钟带,在嘉兴县治东五十里。元时犹不成市镇。成化时村落居人稠密。至弘治,则称为钟带市。万历时亦号“水陆之孔道,辐辏之通衢,设常平仓”,为嘉兴四镇之一〔33〕。

(八)菱湖,又名秀溪、凌波塘。在归安县东南三十六里。古未成聚,宋南渡后渐有市廛,元末毁于兵火。洪武时人居稍集,改称镇。成化、弘治年间,新丝上市,“列肆喧阗,街路拥塞”。正、嘉、隆、万时,“第宅连云,阊阖列螺,舟航集鳞”,几“无隙地,无剩水”,板桥溪港内,处处有人家。“沿湖岸铺及湖内舟船,商贾凑集。总之,各行不下百余户”。万历时“四方舟航所凑,水陆奇珍,百物所环,廛市之徒,摩肩辚毂,挥汗成雨,盖他境繁华所罕与偻”,成为归安县“雄镇”〔34〕。

从上述诸市镇的发展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各县市镇发展并不平衡,但无论是旧有市镇的恢复与兴旺,还是新兴市镇的产生与繁荣,其发展上升的曲线,大致从明代中叶,即十五世纪后期起,变得较为明显;而至嘉、隆、万时期,表现得更为迅速。这

一段时期，亦可称作市镇的勃兴时期。

当然，有些市镇，如长兴县之四安、和平，在明代的发展不甚显著。也有少数市镇，如海盐澉浦镇，非但没有发展，反而“萧条”、“荒废”，不及宋元之盛<sup>〔35〕</sup>。然而，纵观全局，这些发展不显著或衰落的情况，并不是杭嘉湖平原市镇演化的主流。所以，总的说来，无论从规模、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密集性来看，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较宋元时代都有很大的发展。

## 二、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发展的条件与原因

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是建筑在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交通条件较为发达的基础上。该地区在明代政治动乱、战争及自然灾害等破坏因素有所减弱，因而社会生活比较安定。这样，物质生产、商品流通、户口人丁才有可能得到发展；消费的增加、商贾的安全才能得到保证，从而使走集乡曲、价通商贾的市镇，获得居民、商品等要素，得以顺利地发展。同时，杭嘉湖平原地处运河孔道，水网纵横，实为闽粤江淮商旅要津。永乐、正统时对浙西水路的几次大规模整治，筑塘路、浚运河，进一步改善了该地区的交通，有利于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商旅往来的简捷。随着商品交换的日趋频繁，市镇亦因此而迅速发展。

如元末罹于兵燹的乌青镇，经过明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渐有恢复。由于“升平既久，户口日繁”，至嘉靖时发展成“十里以内，民居相接，烟火万家，百货骈集”的大镇<sup>〔36〕</sup>。又如塘栖，在宋元时水路“有三里漾、十二里漾风波之险，而浅狭处几不通舟楫”；陆路则“湊港歧出，既无沿河之堤岸（可行），又无支渡之桥梁”。“水陆交阻，盗贼出没，商贾畏焉”，因而“鲜问津者”。元末拓河道，水路无阻，乃成小市。明正统时修塘岸为路，建造桥梁，“水陆通行”，成为往来孔道，“水陆辐辏，百货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矣”，<sup>〔37〕</sup>变

为大镇。

除了上述基本条件外，造成杭嘉湖平原市镇在明代中后期有较为显著发展的直接原因，在于当时经济生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考其要略，这些促进市镇勃兴的经济原因大致如下：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经济作物、手工业原料生产比重的增加，为市镇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明代杭嘉湖平原因山地的利用、海涂的开发、水利筑堤的讲求、水稻栽培技术的提高、桑豆的间作及南瓜、蕃茹等高产辅助淀粉作物的引进，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这一切不仅会导致农村内部贸易的重大发展，而且还对市镇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不过，农业生产对市镇发展影响最为深刻之处，还在于其经济作物、手工业原料生产的比重出现了相当大的增加，即“桑田多，稻田为之渐窄”〔38〕。从湖州府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农业生产中这种格局的变化。

水稻原是湖州平原最重要的农产品，宋朝时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但入明后，水稻生产独占小农业生产主导地位的状况渐被动摇。明初朱元璋下令广植桑麻、木棉，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又“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税粮”〔39〕，政府教民栽植桑树，例不起科。因而土地肥沃的湖州，蚕桑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德清县“明洪、永、宣德年间，敕以县植桑，报闻株数，以是各乡桑柘成荫，蚕缲广获”〔40〕。成化、弘治以后，封建统治者对杭嘉湖一带出产的丝织品消费需求日益增加，频数派造，追加不已，又进一步刺激了该地蚕桑生产的扩大。正德时德清稻米就须仰食他县。嘉隆时湖州“田中所入，与桑蚕各具半年之资”〔41〕。傍水之地，遍植桑树，“无一旷土，一望郁然”〔42〕，新丝妙天下。农家于“蚕事”“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过之”〔43〕。宋时特宜水稻的湖州，变而为“宜蚕”〔44〕。所以，到了万历后期，缫丝易粟现象非常普遍。崇祯时，“蚕桑乃湖民衣食之本”〔45〕，已取代水稻，在小农经济

中据有主导地位。

关于这种格局的变化,我们还可从湖州府水稻由明初的“极廉”而变为明末的“极贵”;人们服饰的由“陋”变“侈”<sup>[46]</sup>;原为珍贵贡品的花绸,明末则“处处有之”等社会现象中<sup>[47]</sup>,窥见水稻生产比重的下降和蚕桑生产比重的上升。

“桑地之利,每倍于田”<sup>[48]</sup>;“丝、谷相较,莫如丝”<sup>[49]</sup>。因而,这一重要的变化,表明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到了明代有很大的发展。经济作物生产的发达,使农民之间、农民与工商业者之间商品交换就更感迫切。这样,为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作为手工业原料集散或加工基地的市镇,亦应运而生,或出现连锁的兴旺。如明末的南浔,就因为“蚕丝入市”而“客商云集”,成为“彬彬然一大市镇”<sup>[50]</sup>。

不仅湖州如此,他府亦然。如海宁县袁花镇,在嘉靖至万历的数十年间发展最为迅速,当铺由一处变为十四五处,镇上商品亦变得几乎与“杭郡无异”。目击此“白云苍狗”之变的许敦休,评其原因道:“今之所胜于昔者,是蚕桑之业为妙。当初袁花无桑,间有十中一二,亦不过一、二亩。今遍地皆桑,细户亦植数十株于田畔,一春可得二三两,能济插种之费”<sup>[51]</sup>。可见蚕桑的发展改变了袁花的面貌,引起消费需要的增加和商品流通的繁荣,带来市镇的发展。本文第一节中所举诸市镇,亦大多位于手工业原料的生产基地,并伴随原料生产的增加而较快地发展起来。

(二)手工业生产的发达,生产技术的进步,带来市镇的加速发展。

随着杭嘉湖平原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大幅度上升,尤其是蚕桑生产的发展,为该地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丝织品、棉纺织品不仅数量有明显的增加,同时专业性分工程度也愈为明显。如双林镇之包头纱、临平镇之生丝、王店镇之褚绸、硖石镇之天水碧绸、乌青镇之木棉布、濮院镇之濮绸、菱湖镇之纺绸,皆各具



特色,驰名遐迩。因此,某些市镇不光是商品的聚散地,而且还是商品的加工、生产场所。所以,手工业生产的发达,特别是明代后期丝织工具的改良、工艺技术的提高,一方面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商品交换更趋频繁;另方面引起手工业扩大再生产,工商业户之人烟聚落因此空前增加,市镇规模得以迅速扩大。

如双林镇,洪武时户犹未广,但因蚕桑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亦随之兴旺,成化时民家皆织绢,“于是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人口倍于前”。“正嘉以前,仅有高溪纱帕”,“隆万以后,机户巧变百出,名目甚繁”。工商业的兴旺,导致“鬼沙蓼岸,变作桑田;花坞板桥,翻为机杼”,而“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由是竟成为“轻缣璀璨,贾服满装”,“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的大镇<sup>[52]</sup>。

濮院镇的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联,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该镇在隆庆、万历间“改土机为纱绸,制造绝工,濮绸之名遂著远近”<sup>[53]</sup>。万历时机杼渐盛,市镇旧有的规模已满足不了实际生活的需要。为了适应纱绸生产的发展,出现“拓街衢,广庐舍”,“绵亘逾倍”的兴隆景象,而“傍镇瘠田,亩值二三金者,争攫为房基,加值过百金”。十数年间,“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于是集往”,迅速地成为嘉禾“巨镇”<sup>[54]</sup>。

### (三)商业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市镇的产生与繁荣。

市镇既然作为商品聚散、生产的场所,那么,它就一方面需要使本地的商品运销他方,另方面也需要外地商品弥补本地的不足。因而,在产、销、供需反馈对流过程中起居间媒介作用的商业与商品货币,就与市镇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且,“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sup>[55]</sup>。商贾往来或定居者的增加,既缩短了商品的流通过程,扩大了交换范围,又加速商品生产的发展,增强市镇的

职能,推动了市镇的勃兴。

明代后期的杭嘉湖平原,“桑麻遍野,茧丝绵苧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sup>[56]</sup>,是徽州商人、太仓商人趋之若鹜所在。市镇中出现“以招商为业”的牙人<sup>[57]</sup>,云集着吴越、闽海的贾客。这些“对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要素”的商人,推动了“变革”<sup>[58]</sup>,使该地市镇出现长足的发展。明末“行商有税,而坐商无税”的状况<sup>[59]</sup>,无疑对商户的定居市镇,起到积极的作用。钱唐县范村,万历时正因为客商货物多于此停居,而成为巨镇;德清县的新市镇,也是由于客商贩夫络绎于道,至正德年间出现米行、丝行、叶行等大宗贸易的集市,呈现一派居货盈肆的繁荣景象。

商品与货币关系的发展,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存在,如省会杭州,“百货所聚”,有“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桔,温之漆器,金之酒”<sup>[60]</sup>,假巧繁华,民多以商贾为业,商业功能日趋增强。乡村则在利润动机与市场因素的影响下,亦有很大的变化,丝纆泉纆、机杼女红之“末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上供赋税,下给府仰”的重要地位<sup>[61]</sup>。一些乡村亦打破了墨守的陈规,由出产稻麦桑麻而渐渐转为专业性的农业或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基地。如万历时,乌程县上箬、下箬二村,“村人取下箬水酿酒,醇美胜似云阳,俗称箬下酒”,又有“三白酒”,远近闻名,可与“乌程之浔溪、归安之菱湖争胜”<sup>[62]</sup>。而同郡的晟舍、织里诸村,村民以刻印书籍外销松江、钱塘为业。昔日南浔七里村独产的细丝,此时乌程、归安诸乡都有出产。再如嘉靖时,归安四乡出现了一些专门“业织”、“业桑菱”、“业薪竹”、“业蔬苧”、“业藕”、“业苇”的村落。另外,“流风习染,汰侈相尚”<sup>[63]</sup>,乡村的消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城乡消费与生产的滋繁,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亦使处于城乡之间商品对流中枢的市镇,“水涨船高”,随之日益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虽则明代海禁甚严,海外贸易较宋元有所下降,但到明代中后期,政疲法弛,湖丝、杭纺、嘉绢成为走私者远销

海外的重要商品。嘉靖时勾结倭寇进行海上走私活动的著名人物叶麻,就是崇德县石门镇人。到万历末,杭嘉湖一带丝织品的走私现象更为严重,“市民逐利者,以普陀进香为名,私带丝绵毡罽等物游诸岛贸易,往往获厚利而返,因而相沿成风”<sup>[64]</sup>。所以,明代中后期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显然与丝织品海外贸易市场的扩大不无关联。

(四)跟农业分离人口的不断增加,为市镇的发展提供了人力后备资源。

市镇以一定数量的居民为其存在的前提,若其发展,当然仅靠旧有居民的繁衍是不够的。明代中后期的杭嘉湖农村,一则因人丁自然增长过速,日趋地狭人稠<sup>[65]</sup>;二则因土地兼并和农民负担的加剧,造成大批农民破产、流亡<sup>[66]</sup>;三则为利所驱,“舍本逐末”、弃农经营工商者增多<sup>[67]</sup>;四则户口制度的松弛<sup>[68]</sup>;五则市镇生产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sup>[69]</sup>;这些原因造成许多农业人口脱离乡村而涌入市镇谋生,使市镇获得人口来源而不断发展。本文第一节中所举的市镇,其“生齿日繁”、“四方辐辏”、“氓隶杂处”等情况,以及石门镇“土著流民错而居”<sup>[70]</sup>,实际上就含有农业人口流入市镇朝工商业转移的内容。

总之,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是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的,它是经济、政治、自然地理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且,这些多元的因素又是互相影响、彼此联系着的。如元末经济凋零的状况,迫使慑于农民战争威力的明初统治者在干戈百战之后,采取“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休养生息治国方略,兴农桑、修水利、治交通。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劳动人民以辛勤地劳动开辟了明代中期经济繁荣、人口增殖的局面,物质生产更为发达,商品流通日趋频繁,旧市镇在元末战争的废墟上得到恢复,新市镇则应运而生。然而,这一切却引起封建统治者物质消费胃口的膨胀,故态萌发,追加无度。从而一方面使丝织等消费性商品生产更为加快,

另一方面造成脱离农业的人口流入市镇。同时，劳动者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出新的生产技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亦不断通过“代役银”、“一条鞭法”去调整征敛的方略，商品与货币的地位更加上升，使市镇出现变态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更加刺激统治者的挥霍无度。骄奢淫逸的生活，则与腐败腐朽的政治互为连锁，所以在商品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却孕育着诸如统治集团内部分赃不均的你争我夺，劳动人民的反压迫、求生存等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举办公共工程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职能亦大为退化。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矛盾等尖锐化时，必然激起社会鼎革的波澜。虽然市镇在明末的天灾人祸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出现萧条的景象，但激化的社会矛盾松弛了，经过清初的短暂恢复，市镇又获得发展的机会。诚如马克思所说：“亚洲城市的兴旺，或者说得更好些，完全与政治的消费有连带关系。”〔71〕

故尔，在探讨我国古代市镇发展原因时，如果简单地认为市镇的发展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军事部署的结果，排斥当地经济发展的因素；或者单以经济原因概其全貌，忽视社会政治生活、生产技术等对市镇发展所起的作用，这都不足以完整地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未免失之偏颇，是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 三、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 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明代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除增加封建政府的税收外，还对繁荣经济生活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促进乡村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市镇的发展，使商人这一“变革”因素与乡村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从而进一步触动杭嘉湖平原乡村中旧有基本经济要素的结

构,使富有闭关自守惰性的乡村,商品经济日趋活跃,风气为之渐开,即所谓“世风日奢,人心日恣”<sup>〔72〕</sup>。如昔日闭塞冷落的小村塘栖,至嘉、万时成为区域性贸易中心,村民“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骛,肩摩迹累”,通过镇上的市场,去扩大自然经济的交换范围。甚至大宗产品,也不再发生长距离运输费用的问题。又如秀水、嘉善四乡出产的生丝,亦可就近在机声轧轧的濮院镇织成精美的“濮绸”而远销四方,原来狭小的市场变得更为广阔。市镇的崛起和兴旺,使它与乡村之间逐渐形成经济作物生产、加工、聚集、销售的连环。商品流通的方便和流通过程的缩小,可信赖的市场买卖,这些都对农业生产由非商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演变,起到直接地催化,使生产愈为从属于交换价值,加速杭嘉湖平原蚕桑、棉麻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形成。

另外,市镇工商业人口和居民的增加、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它无论对粮食、农副产品、手工业生产原料的需求量都有所增加。同时,市镇的发展还方便了农村日用品、农具等的购买,繁荣了农村市场,并且诱发乡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引起“文明日启”的变化,产品交换变得更为迫切,货币关系也日益排挤实物关系。如伴随袁花镇市肆商品的充盈,当地的世俗由“质朴”变为“华丽”,染坊算帐亦由“付以米、麦、豆、鸡、鸭、鹅之类”,而变为需付“现银”<sup>〔73〕</sup>。这些因素都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以适应客观环境变化的需要。

## (二)增强封建城市的商品性职能。

杭嘉湖平原具有经济职能市镇的发展,使城市商品性比重大为增加。首先,市镇的发展扩大了城市商品的流通网点,密切了城乡经济关系,使米薪百货皆仰给四方的中心政治城市,其所需农业商品的聚集过程,变得更为方便。如减空无储的杭州,所需稻米果蔬等消费品,无须到乡间分散搜采,即可在湖墅、留下、范村等镇得到满足;手工业生产所需的茧丝、络麻,又可从临平、塘栖等镇得到

直接的输入。同样,城市出产的商品及四方聚结的货物,亦通过市镇的贸易活动而流入乡村,袁花市肆商品,在万历时几与杭城无异,就是最好的佐证。

其次,市镇发展又带来商品的增加,引起商业活动的频繁,输入城市商品的渠道就愈广,丰富了城市商品交流的多样性和集中性,增添城市的经济色彩。如硖石镇的天水碧绸,双林镇轻薄如雾的包帕丝巾,就是经过杭州、湖州等更为高级的市场之集聚,再向海内外市场流通。市镇的发展,对郡县城市工商业中心的形成起到明显的推动。

第三,杭嘉湖平原专业性手工业市镇的发展,对城市手工业商品生产起到积极的补充。城市的一些产品,实际产地却有不少来自市镇,如嘉兴府濮院镇的绸缎,就被称作“杭州濮院绸”而远销四方<sup>[74]</sup>。可以说,市镇发展所带来城市在经济机能上的延伸,已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封建藩篱。

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市镇有如萌发于乡村土地中的楔子,既振荡了乡村原有自然经济的稳态,使之日益被卷入城市商品货币关系的漩涡中;又使城市的经济职能也借此而得到加强。那些认为“郡县城市尽管可以人为地大肆膨胀,农村经济却很少受到影响”的看法,显然是低估了明代市镇在繁荣城乡经济生活中所起到“通有无,均赢缩”的中介作用<sup>[75]</sup>。

(三)商业性市镇的发展保护了自然经济,延缓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手工业专业市镇的发展,却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

杭嘉湖平原的明代市镇,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如范村镇这样的商业性市镇;二是如濮院镇,主要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三是如塘栖镇,既有商业功能,也有手工业生产功能。就前二类市镇来说,虽然都对促进经济繁荣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毕竟是有所差别的。

先从商业性市镇说起。由于杭嘉湖乡村的生产方式是由小规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而构成，自然经济建筑在“男耕女织”的基础上，所以，商业性市镇的发展，虽然振荡了乡村自给自足的稳态，导致农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但只是扩大了自然经济的交换范围，却没有动摇小规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即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旧生产方式。因为伴随市镇的发展，乡村的种植兴趣只是由粮食转向桑麻、棉花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没有越过小规模农业经营的雷池。而且，经济作物的上升，如蚕桑的广植，也只是换来家庭手工业（缫丝、织绢）与商品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女织”地位更为提高。这些都未曾打破“男耕女织”的固有传统。相反，乡村却因家庭手工业经济利益的增加，进一步巩固小规模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明代后期菱湖镇四乡植桑的广泛与绵绸、生丝生产的普遍，崇德县乡村以家庭手工业弥补小规模农业之不足，“惟蚕息是赖”<sup>[76]</sup>，这些例子就表明它们结合的巩固。因此由市镇发展引入的商人资本，并没有切断小规模农业生产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纽带，反而维护了这条纽带的韧性。

此外，商业性市镇的发展，使农家手工业丝织品更富商业性，流通日趋方便。由丝织品贸易市场扩大而获得的利益，改变或克服了过去因闭塞状态这方面因素带来的贫困。“虽赋重困穷”，而“民未至于空虚”<sup>[77]</sup>，农民濒于破产的命运得以维系，处于“不死不活”的低劣水平。

虽然商业性市镇的发展引起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乡村陈旧的生产方式却愈加顽固地存在，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国内市场之扩充与巩固，自然愈难得到根本的实现，封建社会传统的生产方式、封建社会的解体，都得到了延缓。

再从手工业专业市镇来看，它的发展却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是与市镇本身的三个特点所造成：

第一,市镇“去郡邑远,官法不能尽行”〔78〕。它除驻有少量的税务、稽察人员外,几乎没有咄咄逼人的官僚政治机构的驻扎,受到中心城市政治束缚较为松弛,封建秩序也比较混乱,容易成为“氓隶杂处”、“邻壤髡黥之徒”,“往往匿姓名、托佣作于其间”的场所〔79〕。故尔,市镇在吸收乡村人口转而工商业人口的过程中,有优先的条件成为最直接的据点。对于那些既有乡土之恋、宗墓之情,而又丧失生产资料的破产农民来说,附近市镇就更是他们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活资料的理想场所。

第二,市镇脱胎于乡村,崛起或兴旺的历史又远比郡县城市为短暂,它的手工业生产既不象中心城市那样受到织染局等官商的直接干涉,又缺乏根深蒂固的行会基础,更没有传统旧宗族、师徒关系的遗传,相对说来受行会制度的控制,就较中心城市淡薄得多,有利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固然明代杭嘉湖平原与中世纪后期地中海沿岸的市镇不尽相同,但它们不受或少受封建行会组织的限制、干涉,却有相似的得天独厚。

第三,市镇的生产活动以专业的工商业为基础,与农村有根本的差别;市镇的居民也为四方杂处,不象同宗同姓为单位的自然村落那么单纯,它已初步地摆脱了乡村中神权、族权的羁绊,农奴制残余对之影响甚少。

所以,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就较易在这些既非残存着农奴制的乡村,又非主权中心的郡县城市,而且专业性手工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市镇中找到适合其生长的土壤。事实上在嘉靖至万历以后,杭嘉湖平原市镇的手工业生产中就已出现了若干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如丝织业较为发达的塘栖镇,“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辏”〔80〕,出现“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现象〔81〕。再如石门镇油坊“可二十家”,雇工“八百余人”,“商人从北路夏镇、淮扬、楚湘等处贩油豆来此作油、作饼,又或转贩于南路”。



这些油坊每家雇主拥有数十名“类赤身亡赖”的雇工<sup>〔82〕</sup>，雇主生产目的不只是为了维持生活，而是为了增加财富，具有“资本主义作坊”的性质<sup>〔83〕</sup>。因此有些同志否认明清市镇中曾出现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显然是不科学的。

当然，明代杭嘉湖平原的市镇，大多数是属于第一、第三类的市镇，即商业性市镇、商业兼手工业性质市镇为多，而专业性手工业市镇为数甚少，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显得较为微弱，而且受到它对立面的顽强压抑。不过我们在讨论市镇作用时，对此却不当视而不见，尤其应对商业性市镇、手工业专业生产市镇在经济生活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进行分别的考察，这样可以避免绝对化带来的混乱。

#### （四）推动江南等地的经济繁荣。

由于毗邻与交通往来的方便，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还对整个江南经济区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且不说塘栖镇的商人，往来于南京、苏杭，“商旅之舶，日夜络绎不绝”而带来的商品流通频繁<sup>〔84〕</sup>，也不说乌青镇、王江泾对盛泽、震泽兴起的影响。就以丝织、棉纺的交流来看，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南浔镇聚集的蚕丝，就成为“苏人”“用织帽缎”的上等原料；而吴江洞庭东西山盛产的桑叶，又通过南浔的叶行借以流入乌程四乡。<sup>〔85〕</sup>又如“松江织造上贡吴绫之原料，浙产为多”<sup>〔86〕</sup>；而乌程、海盐各地所“产木棉花甚少”，却“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sup>〔87〕</sup>。这些原料的调剂，就依赖市镇的商业活动得以完成。市镇在跨郡县的商品交流中，起到打破封建区域性分割的进步作用，加强江南各地的经济联系，促进棉纺、丝织区域性分工生产的形成，使江南成为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至于更广泛地区的经济生活，如为北京宫廷和市場提供丝织、棉织品；满足福建对湖丝、织纱帛的需要；刺激明代中后期的海外贸易活动；丰富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的物资交流；甚至日

本、南洋、美洲市场丝织品买卖的兴旺，都无不与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sup>〔88〕</sup>市镇发展所引起的经济活动，已超出原有的地理范围，而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 （五）奠定清代市镇进一步繁荣、发展的牢固基础。

虽然明代杭嘉湖平原兴起和发展的市镇，在明清之际的动乱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经过清初短暂的恢复，它们很快出现较大的发展。如濮院镇，康熙以来“绸业日盛”，不仅拥有大批“专习一业”的丝织技工，而且还出现“涑坊”等规模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作坊，各省直客商熙熙攘攘。至乾隆时生产亦由万历时“日出绵帛千计”，变而为“日出万绸”，“衣被海内”<sup>〔89〕</sup>；又如菱湖镇，康熙时恢复成“烟火万家”，乾隆时“商贾繁凑，尤甚于前明”<sup>〔90〕</sup>；与它同郡的双林镇，顺治末年发展为周围十数里、居人三四千户，“高门鳞次，甲第连云”的大镇，康熙以来更是“人烟繁庶，街市充盈”<sup>〔91〕</sup>；再如南浔镇，入清后成为“环镇五六里，灶烟数万家”，招引着广东等地的客商<sup>〔92〕</sup>。

与明初市镇恢复速度相比，清初的发展显然要迅速得多。这种迅速发展固然有多种因素的推动，但肇其源，不能不承认明代市镇的发展，已为入清后市镇的兴旺奠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直到清末民初，这些由明代发展起来的市镇，一直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sup>〔93〕</sup>。

综上所述，十五、六世纪之际，正当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最初萌芽时，资本主义的因素，也在长江三角洲运河流域的专业性手工业市镇中，找到适合其生存的土壤。同时我们还得看到，市镇商业的发展，却延缓着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资本主义萌芽从它在封建母体中存在的那天起，就受到伴随它一起发展的对立面顽强地压抑，使之在母体中就进行着痛苦的挣扎，缺乏先天的营养而难以健康地成长。然而，尽管这一萌芽是如此

地脆弱和随时有夭折的危险,但它的出现,毕竟表明封建社会母体有了新的变化。从明代中后期杭嘉湖平原市镇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孕育社会形态变化的端倪。

### 注释:

- 〔1〕嘉靖《余杭县志·市镇》，见嘉庆《余杭县志》卷三《市镇》。
- 〔2〕康熙《杭州府志》卷二《市镇》。
- 〔3〕陆游：《剑南诗稿》卷五二《送客至湖州市》。
- 〔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二《北山分脉城外胜迹》。
- 〔5〕佚名《北新关志丛抄》，陆玄锡：《北关修荆街碑记》。
- 〔6〕万历《钱塘县志》卷五《纪事·湖墅大火》。
- 〔7〕周广兴：《宁志余闻》卷一，赵希樾：《抱拙小稿·过临平诗》。
- 〔8〕张大昌：《临平记补遗》卷三，引成化《杭州府志》。
- 〔9〕沈谦：《临平记》卷一。
- 〔10〕陆游：《渭南文集》卷四三《入蜀记》。
- 〔11〕嘉靖《海宁县志》卷九，苏平：《长安晓钟诗》。
- 〔12〕夏辛铭：《濮院志》卷一。
- 〔13〕濮道水：《濮川志略》卷一一《传咏》，方孝孺：《泊舟南湖》。
- 〔14〕同上书卷一《开镇说》。
- 〔15〕万历《秀水县志》卷一《市镇》。
- 〔16〕董世宁：《乌青镇志》卷三，张应雷：《复添设馆府佐官员疏》。
- 〔17〕蔡蒙：《双林镇志》卷一八。
- 〔18〕陈霆：《新市镇志》卷一《山川》。按：据万历《余杭县志》，此处“行”为当地“方言也，取其通日用之长利，非若朝夕稗贩往来不常者”，与宗族、帮会色彩的“行会”有别。
- 〔19〕万历《湖州府志》卷三《乡镇》。
- 〔20〕董斯张：《吴兴各志》卷三〇。
- 〔21〕汪曰楨：《南浔镇志》卷六《古迹》，董份：《张君东壁记》。
- 〔22〕同〔20〕。
- 〔23〕王同：《塘栖志》卷一七，丁养浩：《明故存济沈公夫妇墓志铭》。
- 〔24〕张之鼎：《栖里景物略》卷二，屠隆：《栖真馆文集·唐栖访卓征夫不遇却寄》。
- 〔25〕同上书卷三。

- [26]同[2]。
- [27]许敦律：《敬所笔记·纪世变》。
- [28]嘉庆《嘉兴县志》卷四《市镇》。
- [29]徐士燕：《竹里述略稿》卷七。
- [30]嘉庆《嘉兴县志》卷九《寺观》，高道素：《万历重修竹林庙记》。
- [31]杨谦：《梅里志》卷二，李遇孙：《天香录》。
- [32]嘉庆《嘉兴县志》卷四《市镇》，周质：《东环桥记》。
- [33]《竹里述略稿》卷七，朱廷益：《嘉兴县新建常平仓碑记》。
- [34]孙志熊：《菱湖镇志》卷一、一〇、一一、四二。
- [35]嘉靖《续澈水志》卷九，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
- [36]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村镇·乌程县》。
- [37]《塘栖志》卷一。
- [38]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风土记》。
- [39]《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 [40]康熙《德清县志》卷四。
- [41]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一二《风土类》。
- [42]王道隆：《菰城文献》，见乾隆《湖州府志》卷四〇。
- [43]谢肇淛：《西吴枝乘》，见乾隆《湖州府志》卷三七。
- [44]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
- [45]蔡松：《双林镇志新补·艺文》，坞桥沈氏：《奇荒纪事》。
- [46]《新市镇志》卷一《风俗》。
- [47]郑元庆：《湖录》，引自乾隆《湖州府志》卷四一。
- [48]许天赠：《隆庆元年丈量鱼鳞图归户实征册纪略》，见康熙《海宁县志》卷四。
- [49]万历《崇德县志》卷二。
- [50]《南浔镇志》卷六，范澄：《研北居琐录》。
- [51]同[27]。
- [52]《双林镇志》卷二〇，唐甄：《潜书敦蚕》。
- [53]《濮川所闻记》卷三《织作》。
- [54]《濮院琐志》卷八。
- [55]马克思：《资本论》卷三，第365页。
- [56]张瀚：《松窗梦语》卷七。
- [57]李乐：《续见闻杂记》卷一一。

〔58〕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189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五。

〔59〕茅元仪：《冒言》卷三《肆税》。

〔60〕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

〔6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

〔62〕同〔47〕。

〔63〕万历《崇德县志》卷二。

〔64〕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四。

〔65〕参见谈迁：《海昌外志·艺文》、万历《秀水县志》卷三。

〔66〕参见《续澈水志》卷八。

〔67〕《涌幢小品》卷二，茅元仪：《冒言》卷三。

〔68〕茅元仪：《野航史话》卷一，载“天下户口不入版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谈迁：《海昌外志·食货志》，载“国初给户帖”，“丝毫毋隐，否则立死戍”。“法令寝弛，势得以容其奸。凡登于版籍，俱男而不妇，主而不仆。虽详明之吏，不能家阅而户悉也”。

〔69〕如崇德县石门镇油坊，丁夫“辄募旁邑民为佣”。见万历《崇德县志》卷三。

〔70〕同上书卷九，钱梦得：《宁辑石门市民序》。

〔71〕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卷二，第448页。三联书店1951年版。

〔72〕《栖里景物略》卷一，胡元敬：《蜃朽遗言·栖溪风土记》。

〔73〕同〔27〕。

〔74〕雍正《宁波府志》卷三五《艺文·下》，引《鄞西竹枝词》。

〔75〕同〔2〕。

〔76〕万历《崇德县志》卷二三《风俗》。

〔77〕唐甄：《潜书教蚕》。

〔78〕《味水轩日记》卷二。

〔79〕同〔70〕。

〔80〕同〔72〕。

〔81〕《资本论》卷三，第373页。

〔82〕万历《崇德县志》卷七、一二。

〔8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三，第358页；《列宁全集》卷三，第317页。

〔84〕同〔72〕。

〔85〕《涌幢小品》卷二。

〔86〕崇祯《松江府志》卷六。

〔87〕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南浔镇志》卷三三。

〔88〕参见《明会典》卷三十“户部”二二；弘治《八国通志》卷二五；朱纨：《鹭余杂集》卷二；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王在晋：《越语》卷二一；全汉升：《明末至清中叶后西班牙美洲进行的中国丝绸贸易》。

〔89〕沈廷瑞：《东斋杂记》；《濮院琐志》卷一、七。

〔90〕《菱湖镇志》“序”、卷一四。

〔91〕《双林镇志·顺治十六年双林镇舆地图说》；《双林镇志新补·疆域》。

〔92〕《南浔镇志》卷二四、二八。

〔9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578页，《1847—48年中国各港口的贸易报告》，载“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北面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最大的生丝集中市场有三个，即南浔镇、菱湖镇、双林镇”。按：民国时江南又有“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谣，生丝常由南浔直运上海。